

符号、象征、象征符号, 以及品牌的象征化

赵毅衡

(四川大学, 四川 成都 610064)

摘要: 符号修辞格中的象征, 使用得最多, 意义却最混乱, 且符号与象征二词常被混用, 因此, 清楚地定义符号, 象征, 以及说清两者重合的区域极有必要。这两者的混乱, 不仅是在中文中, 在西文中由于文化历史原因, 更加混乱。再加上翻译者无法加以甄别, 因此近年来的学术翻译中, 在汉语中原先尚比较清楚的分界, 变得更加模糊。因此, 不得不从中西两个根源上加以清理。最后, 从符号学角度, 讨论了象征形成中的“使用原则”, 以及当代消费文化中, 品牌商标象征化的文化符号学机制。

关键词: 符号; 象征; 符号学; 象征符号; 品牌的象征化

中图分类号: I022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2-6924(2010)09-004-010

一

各种符号修辞格中, 最难说清的是象征。糟糕的是: 这个术语使用得最多, 意义却最混乱, 而且符号与象征两个词经常被混用。讨论象征与符号的著作, 在中西文中都极多, 不少还专门讨论两者的区别, 结果似乎越讨论越乱。下面不得不引用中国和西方一些学者的著作, 试图找出混乱的根源。

本来这个问题应当可以用符号学来澄清, 可能也只有符号学才能澄清。但恰恰是在西语的符号学著作中, 这个问题弄得最乱, 因为在西语中, 象征 symbol 一词经常当做“符号”意义来使用, 西方符号学家们自己成为混乱的原因, 这就使我们不得不依靠汉语来澄清西语中的混乱。

当代汉语, 在大量翻译的影响下, 也出现了“符号”与“象征”的混乱, 例如说: “超女是当代文化的符号”, 正确的表达应当是“象征”, 因为任何一个节目或称呼, 本来就是符号, 只有某些符号能变成一种特殊的符号, 即象征。

钱锺书对这个问题看得一目了然, 处理得直截了当: 《管锥编》三卷说“符号”即 sign, symbol。^{[1] (P1864)} 我认为钱锺书先生的处理原则应当行得通: 对于 symbol 在汉语看来是“符号”时, 都译成“符号”; 在汉语看来是“象征”时, 都译成“象征”; 标准由汉语中自行确定, 不必跟着西文一道混乱, 不必凡 symbol 都译成“象征”。

因此, 本文的目的, 是把汉语的术语“象征”与“符号”区分清楚, 顺便讨论 symbol 比较适宜的处理方式。

二

在西语中, symbol 与 sign 这两个词经常混用, 不少符号学家用了整本书试图澄清之, 例如托多洛夫的《象征理论》,^[2] 只是把问题说得更乱。而汉语从书标题译名开始, 就不得不参与这种混乱。可以说, 迄今为止, 汉语中“象征”与“符号”这两个术语的混乱, 是在翻译中产生的: 西方人混用, 翻译也只能在象征与符号中摇摆。但是影响所及, 中国人的书, 也会把本来清楚的汉语词汇分

作者简介: 赵毅衡,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 主要研究方向: 符号学, 叙述学, 形式论。

别弄得复杂。

例如有一本国内新出的学术书, 说是 symbol 此词, “用于逻辑、语言及符号学心理学范畴时, 多译作‘符号’; 而用于艺术、宗教等范畴时, 则译为‘象征’”。^{[3] (P5)} 这话实际上是说, 汉语中“象征”与“符号”同义, 都是 symbol 的译文, 只是“象征”只出现于艺术学和宗教学之中。^① 这种“按学科”处理译名, 恐怕只能增加混乱。

如弗洛伊德认为梦的冲突—压制—替代机制使梦中出现显义与隐义, 显义(manifest)是“图像的一字面的”(pictorial—literal), 隐义(implicit)即是“象征意义”(symbolic), ^{[4] (P64)} 拉康的著名概念“象征界”(Symbolic Order), 按上文说的标准, 应当译成“符号意义”, “符号界”。从拉康的原意考虑, 译成“符号界”可能更正确一些。^②

卡西尔名著《人论》此书的名句, “人是 animal symbolicum”, 现在一般译成“人是使用符号的动物”, 但是也有人译成“使用象征的动物”, 也有重要著作作用此说。^③ 不过原书在术语上还有进一步的特殊分辨: 此书把 sign 解释为动物都会有的“信号”, 而把 symbol 看成人的特点。^[5] 那样的话, symbol 就必须是“符号”。

人类学家 G. H. 米德的学说对符号学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。米德去世后, 他的著作由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兼好友, 著名符号学家莫里斯编辑而成重要著作《心灵、自我与社会》。^[6] 莫里斯把米德的观念称为“符号互动论”(Symbolic Interactionism), 但是这两位符号学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, 偏偏用 Symbolic 一词。

博迪厄著名的术语 symbolic capital, 不少学者译成“象征资本”, ^④ 也有一些译者翻译成“符号资本”, ^⑤ 中文论者也两者混用。^⑥ 我个人认为按博迪厄的本意应当译成“符号资本”。首先因为这个概

念是与“社会资本”、“文化资本”、“经济资本”对比列出。从现代汉语的意义(汉语可以说, “他只有象征性的经济资本”, 却不能说“他只有符号性的经济资本”), 可以看出: 以上各种资本本来就可以是“象征性的”, 而要经过一番社会转换才能成为“符号性的”。博迪厄指出: “symbolic capital 是其他各种资本在被认为合法后才取得的形态”。^{[7] (P241—258)} 因此, 以翻译成“符号资本”为宜。但是博得利亚的著作前后不断地围绕着“符号”与“象征”的对立展开论辩: 早期认为现代性的发展是从象征秩序到符号秩序, 中期认为现代性是从符号秩序发展到象征秩序。^{[8] (P6—9)} 但是在他的思想中, “符号”与“象征”究竟有什么区别呢? 博得利亚 1972 年的著作《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》被认为是转向的路标性著作, 在此书中他举了一个容易懂的例子: 结婚戒指是“一个特殊的物, 象征着夫妻关系”; 而一般的戒指并不象征着某种关系, 因此是“一种他者眼中的符号”, 是“时尚的一种, 消费的物”。而消费物必须摆脱“象征的心理学界定”, “最终被解放为一种符号, 从而落入到时尚模式的逻辑中”。^{[9] (P47—49)} 他的意思是, 象征有心理意义, 而符号则有时尚意义。应当说, 这是相当个人化的用法, 只能说戒指与结婚戒指是两种不同的“象征符号”。

还有一些西方论者把两个术语混合使用, 例如弗洛姆说: “符号是人的内心世界, 即灵魂与精神的一种象征”。^{[10] (P31)} 这句话的意思似乎符号范围比象征小, 只是一种象征。恐怕大部分学者认为符号的外延应当比象征宽得多。

这两个词在西语中是从根子上混乱了, 每一个论者只是更加剧了混乱。甚至现代符号学奠基者皮尔斯, 也把这两个关键的关键词说的更乱, 他使用 symbol 一词指符号三分类之一种规约符号

① 该书同一页上说: “西语语境中的‘象征’偏重以形象指涉理性思辩的对象, 但当这一‘形象’日渐脱离其具体的形态状貌而被单一的‘语言符号’所替代是, ‘象征’就成了一种纯粹的语言现象”。

② 如黄汉平, 《拉康与后现代文化批评》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。“象征界即符号的世界, 他是支配着个体生命活动规律的一种秩序”。

③ 例如王一川: 《语言的胜景: 外国文学与语言学》, 海口: 海南出版社, 1993, 王一川说此语引自甘阳所译卡西尔《人论》, 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本, 1985 年版。《人论》各版都译成“人是使用符号的动物”。

④ 例如褚思真、刘晖译: 《言语意味着什么》商务印书馆, 2005。

⑤ 例如李猛、李康译 邓正来校的译本很重要的布迪厄社会学著作《实践与反思: 反思社会学导引》(中央编译出版社, 1998 亦如陶东风译《文化与权力: 布尔迪厄的社会学》,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年, 第 9 页。

⑥ 例如张意《文化与符号权力》,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05 年。

(convention), 即与像似符号 (icon), 指示符号 (index) 不同的, 靠社会规约性形成与对象关连的符号。但是他有花了很大力气把他的这个特殊用法解释成一般化的 symbol。他说他的用法——

与其说赋予 symbol 一种新意义, 不如说并返回到原初的意义……亚里士多德认为名词是一个 symbol, 是约定俗成的符号。在古希腊, 营火是 symbol, 一个大家都统一的信号; 军旗或旗子是 symbol; 暗号(或口令)是 symbol; 徽章是 symbol; 教堂的经文被称为 symbol, 因为它代表徽章或基督教原理考验用语; 戏票或支票被称为 symbol, 它使人有资格去接受某事物; 而且情感的任何表达都被称为 symbol。这就是这个词在原始语言中的主要含义。诸位考验判定他们是否能证实我的生命, 即我并没有严重歪曲这个词的含义, 并没有按我自己的意思使用它。^[11]

应当说, 皮尔斯举的例子中, “教堂经文代表基督教原理”明显是象征, 营火, 军旗或旗帜, 都是典型的(邻接性)指示符号, 至于“情感的任何表达”, 则是各种符号都有, 而且以像似符号居多(例如表情, 手势, 身体动作)。这种“回到希腊原意”, 在西方可能是一种论辩策略, 但是 symbol 在“希腊原意”中就是有“符号”与“象征”两个意义。皮尔斯这种自辩, 更无法说明他的 symbol 特殊用法(规约符号)之“正确”。实际上“艺术的, 宗教的”symbol 大多具象, 至少起源于相似符号。皮尔斯很明显用语不当, 下文不再讨论皮尔斯这种特殊用法。在这一点上, 索绪尔倒是有所警觉。他说: “使用 linguistic symbol 这个术语, 颇有顾虑。symbol 绝不是空洞的, 在观念和充当观念的符号之间至少有初步的联系。天平——公平的 symbol, 这里存在关联”。^{[12] (P86)} 因此在说“符号”时尽量避免用 symbol 一词。

古希腊语 symbolum 语源意义是“扔在一起”, 表示合同或约定的形成过程。在当代西方语言中, symbol 有两个非常不同的意义。《简明牛津词典》对 symbol 一词的定义是: “1. 一物习俗上体现了, 再现了, 提醒了另一物, 尤其是一种思想或或

品质(例如白色是纯洁的 symbol); 2. 一个标志或字, 习惯上作为某个对象、思想、功能、过程的符号, 例如字母代替化学元素, 乐谱标记”。^[13] 前一定义应为汉语“象征”意义, 后一定义应为汉语“符号”意义。

事到如今, 最好的办法是西文取消 symbol 的第二义(作为“符号”或“规约符号”的意义), 全部用 sign。这当然不可能。语言问题无法由学界下命令解决。本章并不想澄清西文 symbol 的混乱, 而只能讨论中文的“象征”, 即西文 symbol 的第一义。只是必须事先说明: 中西语种两者本来就不对等, 意义混乱的地方也不一样, 翻译时必须仔细甄别, 什么时候在谈的哪一种定义的 symbol, 如果是符号, 就不能用象征。应当承认, 西方人能交替使用 symbol 与 sign, 至少行文灵动方便得多, 但这不是我们把符号译成象征的理由, 因为在汉语中, 象征与符号不能互相替代, 象征只是一种特殊的符号。

有些作者认为符号是浅层次的, 象征是深层次的。甚至有西方论者认为符号是“直接”的, 而象征是其“背后的潜在意义”。^① 持这种看法的主要是某些人类学家, 显然他们思想中的“符号”, 只是某种图像、文字、或类似文字的记号 (notation)。这种对“符号”的特殊理解, 看来无法在人类学之外说清楚, 甚至在人类学中也不应当坚持。

三

在语言修辞学中, 象征已经是个很不容易定义的修辞格。索绪尔本人在讨论德国史诗《尼伯龙根的指环》时说: “史诗作者, 或甚至历史作者, 在叙述两军交锋时也介绍两位首领之间的战斗……这样首领 A 与首领 B 的决斗就不可避免地成了象征”。^{[13] (P366)} 索绪尔用的是 symbol。这种“以将代军”的人物塑造手法(在中国小说、戏曲、电影——例如《赤壁》——中可能用得更普遍), 是一种以部分代全体的提喻, 但是索绪尔这时用的 symbol 可以是象征, 因为这种手法导向象征的形成。

① Miranda Bruce-Mitford and Philip Wilkinson, 《符号与象征: 图解世界的秘密》(Signs & Symbols: An Illustrated Guide to Their Origins and Meanings) 台北: 2008 此书在导论中说: “符号有直接的功能, 它可以是书面或视觉语言的一部分, 警告前方路况的一种视觉词汇, 或公司产品的一个夸大用词。符号给予我们的是一则有立即关联性的简单讯息。另一方面, 象征则是一种视觉图象或标志背后的潜在意义, 代表的是宇宙真理的深层指标。”

但是如果讨论作为史诗的《尼伯龙根的指环》, 在语言学范围中难以说清象征问题, 这时是由于象征概念本身有超语言的符号修辞性质: 从符号学角度, 或许能把象征的特质说的清楚一点。

我们先从象征最基本的情况说起, 而且尽量说得简单明确。首先, 无论哪一种象征, 在修辞机制上, 都是广义的比喻。许多作者在使用中经常混用比喻与象征。一本中国作者写建筑的书, 说罗马帝国的凯旋门等公共建筑, 是“通天之门”的“隐喻”; 紧接着又说凯旋门是“皇权神权的象征”。^[14] 这两者都没有错, 但是为什么凯旋门不是“通天之门的象征”? 为什么不是“皇权神权的隐喻”? 或许应当让作者们换着用, 但是接得如此之紧, 而我们读起来不觉得有错, 说明这两个术语(无论在中文和西文中)部分同义。

象征不是一种独立的修辞格, 因为象征可以起始自任何一种比喻: 明喻, 隐喻, 提喻, 转喻, 潜喻, 象征与被象征事物之间的联系, 可以取其像似性, 也可以取其邻接性。但是象征在修辞形态上与其他比喻种类实际上无法区别, 在语言修辞中无法说象征是一种独立的修辞格。“于丹是新国学热潮的象征”, 是转喻; “黑色是闻一多晚期作品忧郁情调的象征”实为提喻; 蓝波说“O 象征太阳金色的阳光”, 是跨渠道通感比喻。钱锺书说“同喻异边”, 象征也可以多边。例如龟在中国古代象征长寿, 为中国寿文化的主要符号, 成为重要礼仪元素。元代之后, 俗文化兴起, 龟与蛇等肮脏爬行动物生活在一道(邻接)而被喻为通奸男子, 从而延伸出“龟儿子”、“王八蛋”等侮辱用语。这两种象征基于不同根据性, 两者在同一文化中似乎也并不冲突, 可能因为使用的文化场合有很大等级差。叶芝曾指出: “当隐喻还不是象征时, 就不具备足以动人的深刻性, 而当它们成为象征时, 它们就是最完美的了。”^[15] (P45) 象征是否为“完美的比喻”, 暂且不论, 象征的确是比喻的发展。

比其他比喻, 象征的表现体更是超语言, 超单独媒介的。上文已经说过, 跨语言跨媒介的比喻, 是概念比喻的特征。因此象征的出发点往往是跨媒介通用的概念比喻。例如十字架, 新月, 万字之于基督教, 伊斯兰教, 佛教, 这些象征无论用什么媒介表现, 无论是图像、雕塑、语言、姿势来表现, 依然是同一个象征。

第三, 经过如此的变异与积累之后, 象征的意义所指总是比较抽象, 经常是无法“意释”的精神境界(état d'âme, 例如佛教中用莲花象征纯洁), 或是不太容易用别的方式表达的(例如经轮象征佛法), 甚至难以形诸语言的事物(例如品牌象征的趣味品位与社会地位)。这就是为什么本书强调象征必须在符号学中才能讨论清楚。哲学家谢林说象征是“以有限方法表现的无限”, 这个定义不清楚, 但是“无限”一词, 点出了喻旨说不清的特征。荣格说得比较明确: “象征意味着某种对我们来说是模糊的, 未知的, 遮蔽的东西”。^[16] (P3)

卡西尔一方面把 symbol 最普遍化, 等于 sign; 另一方面又给 symbol 最“精神性”的定义: “‘symbolic form’ 应理解为一种精神能量, 借其之助, 使一种精神内容, 和一种具体的感性 symbol 相联系, 并内在地属于这 symbol”。^[17] (P43) 这的确是象征的定义: 象征的符指对象必须是一种“精神形式”。象征的本身却必须具体。

刘熙载《艺概·词概》名言: “山之精神写不出, 以烟霞写之; 春之精神写不出, 以草木写之。故诗无气象, 则精神无所寓矣” 写不出的“精神”, 宜以形象表现。只不过刘熙载说的是“词”这种文学体裁, 是指描写这些形象的语言: 此时我们就看到了象征的“符号载体级差”: “烟霞”、“草木”这些形象, 可以是景色(物象), 可以是美术、照片、电影等再现(图像), 可以是文词, 也可以是文词描写的场景(语像), 或者文本集合, 例如文学作品景色描写(文本景像)。例如《黄土地》全剧构成一个景像象征, 《边城》全书构成一副景像象征。

在某些特定情况下, 象征也可以不涉及如此大规模的或抽象的“精神意义”, 而使用于非常具体的效果祈求: 给人贺喜画上红蝙蝠, 象征“洪福齐天”; 往新娘床下放红枣, 花生, 桂圆, 瓜子, 喻“早生贵子”。这些只是利用“语音相似”(phonetic iconicity)祈福, 钱锺书先生称之为“声音象征”(sound symbolism)。也有解字音字形兴文字狱: 雍正时, 翰林官徐骏在奏章里, 把“陛下”的“陛”字错写成“狴”字, 雍正帝见了, 马上把徐骏革职。后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两句诗: “清风不识字, 何事乱翻书?” 于是说是诽谤清朝, 徐骏死罪。此时使用象征, 只是因为(或断定)符号发送者不便或不愿直言。祈福或降祸, 均托之于仪式化象征, 基于其

婉转非直言效果。

因此象征可以有一系列规模迥异的表现方式,从单元符号,进入大规模文本符号;从物象,到图像,到语像,到文本景像。有论者提出象征就是“被赋予文化意义的符号”,^①应当说,符号的意义,都与文化有关,没有文化性的意义,两个个人之间的符号交流都不可能。因此象征的意义,不仅是文化意义,而且是在集体使用中累积而形成的,比较抽象而难说清的精神性的文化意义,或因各种原因不便不宜直接说的文化意义。

四

象征的符指含混但常常宏大,许多文化符号,尤其是具有“神话”式精神表意的符号,就被人有意推向象征方向。象征意义往往是历史地积累起来的,符号使用中的不断“片面化”渐渐倒空原符号意义,代之以新的特殊意义;形成象征的关键是重复使用所造成的变化与意义累积。

下文列出若干把普通修辞格变成象征的方法,可以说:所有方法都必然利用符号使用者(发出者,解释者)共享的文化意义积累。正因为象征不停留于比喻,它积累起超越修辞水平的丰厚意义,因此它有一个意义形成过程,这个过程的关键,就是重复:文化对某个符号进行重复,使用符号的个人或集体对符号进行重复,都可以达到意义积累变成象征的效果。

文化群体使用某形象表达意义有一定积累,就会成为象征。《诗人玉屑》卷九“托物取况”：“诗之取况，日月比君后，龙比君位，雨露比德泽，雷霆比刑威，山河比邦国，阴阳比君臣，金玉比忠烈，松竹比节义，鸾凤比君子，燕雀比小人”。

文学语言如此排列一一对应,可能过于机械,但是象征的文化规定性的确有一定的组合规则。例如中国的风水术就是复杂的组合象征:建筑选址负阴抱阳:前面有案山,有池为朱雀,有小折河应“金带环抱”;背面有座山,为玄武,东边引水成渠以喻青龙,西边有路谓之白虎。风水的象征体系,起始明显是为官宦人家社会地位即社会欲望的象征祈福。

集体象征可以很隐蔽,例如艾略特《荒原》中依靠的主要象征系列,是古代繁殖神神话,因为变形过于复杂,引用过多,作者不得不加了许多注,诗人给作品加注以说明象征,这是很少见的例子。《荒原》的象征,实际上接近原型象征(archetypal symbol),即在部族,甚至全体人类经验中植根很深的某些形象:例如太阳象征真理或阳刚,月亮象征美丽或阴柔,春天象征希望,四季象征生命。有些论者认为:所有的原型象征,实际上是先前作品使用形成的历史积累。如果考虑到在有记录的艺术与文学出现之前很久,人类已经有上万年的符号文化,解释象征意义的确是靠重复使用积累起来的。

例如华表,原是原先是一种路标,尧舜时代长为供百姓告状的“谤木”。晋代崔豹说:“今华表木也,以横木交柱头,状若花也,形似桔槔,大路交衡悉施焉。或谓之表木,以表工者纳谏也,亦以表识肠路也”。后世华表的路标与“谤木”功能早已消失,上面不再刻以谏言,而为象征皇权天授的云龙纹所代替,是皇家建筑的一种特殊标志。而在当代,则成了中华民族的象征。因此华表的象征意义,是历史性地变易与累积所得。

数字也可以是有历史原因的象征:耶稣有十二门徒,这个数字的意义来自《旧约》:在以色列旷野里有十二股活泉解渴,此后成为犹太的十二支派。耶稣如果真选了十二个信徒,或是耶稣门徒自称有十二人,可能就是想到十二这个犹太民族的象征数字,让他们代表整个民族;如果十二是基督教建立后声称的,更是有意追溯犹太教渊源。这个数量象征,最后去象征化,变成普通数量词“打”。

荣格认为组成集体无意识的主要是原型象征。原型是人心理经验中的先在的决定因素。促使个体按照他的本族祖先所遗传的方式去行动。人们的行为,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无意识的原型所决定的。神话象征影响着我们的行为,尤其是情感活动。在梦、幻想、宗教、神话、传说中,这些原型会显现出来。荣格的“自我”概念也是一种重要的原型,它包括了潜意识的所有方面,具有将整

^① 陈华文《文化学概论》第八章“文化符号与象征”,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4 年,148 页:“象征是从一种固定的文化形态中赋予或开掘出更多的文化意义,换句话说,象征就是给文化符号赋予更多的价值和意义”。

人格结构加以整合并使之稳定的作用。与集体无意识和原型有关的另外一个概念,是从印度教和佛教借来的曼陀罗(Mandala),指的是一种回旋整合象征,在不同文化中反复出现的人类力求整体统一的精神努力。^①荣格的原型象征理论,深入宗教、历史和文化领域。弗洛伊德的学说是悲观的,他看到的是阴暗的力比多力量无可阻挡,人只能略做些敷衍塞责的对抗;荣格的原型象征说却比较乐观,他把原型象征看成一种人类试图与神圣或神秘接触的努力。

过于特殊的安排,形成组合轴上强大的聚合系,也可以形成象征。戈达尔的电影《芳名卡门》(Prenom Carmen)中多次出现海鸥的叫声,但是镜头往往是巴黎的夜景与车流,不可能出现只有在天宽地阔的海边才有的海鸥叫声。这种“断裂性”的插入元素只要有几次,就变成了一种抽象意义的象征。

艺术家有意让一个形象多次出现,重复着力表达,也可能获得意义更深远的象征意义。这实际上是艺术家自己进行重复。英国莎士比亚专家卡洛琳·斯博琼(Caroline Spurgeon)1935年首先分析莎士比亚戏剧中的“复现形象”(recurrent image),发现累积意义可以成为象征。例如《哈姆雷特》剧中的疾病形象,《麦克白斯》中的“赤裸婴孩”形象。布鲁克斯在《精制的瓮》一书中进一步研究了复现语象累积意义的方式,以至于弗赖评价说:“对复现语象的研究是新批评的主要方法之一”。^[19]

实际上仅仅复现本身是不够的,这些语象指向文本的主题,才能获得象征的分量,因此往往被称为“主题形象”(thematic image)。孔尚任《桃花扇》中反复提及的扇子(提扇,溅扇,寄扇,撕扇)使它成为爱情中女子的气节与国难中民族气节的象征;俄国导演祖亚金瑟夫的电影《归来》中重点而反复出现的“爬高”形象,成为孩子长大的象征。

如果要避开重复所需要的篇幅或时间,艺术家经常建立自己设置的“私设象征”,这种象征可以直接点明。毕加索名画《格尔尼卡》的象征“黑白灰三色是压抑,公牛象征兽性与黑暗,而受惊的

马代表人民”。这是他自己设置的,用的方式是映现,即使在形象的配合中显示与对象(格尔尼卡轰炸惨案)的共型性。上面引用的是他事后的说明,但是当时观众,靠标题的明晰作意义主导参照,也看懂了这样的象征配置。惠特曼纪念林肯的名诗《当紫丁香最近在庭院开放》开头两行:

每年开放的紫 香,那颗在西方陨落的星
和我对我所爱的人的怀念

紫丁香的象征被直接点明。叶绍翁诗:“满园春色关不住,一枝红杏出墙来”,点名红杏象征春色。这些所谓“私设象征”,不可能完全没有文化根据,没有集体用法的基础。每年重开的花,陨星,与纪念死者本来就有关。杏花灿然高于墙外,也是大家认可的春日景色。至于“红杏出墙”此后的延伸象征意义,则是使用社群共同的文化积累,不是诗人原先设立的。

我们可以看出,要形成一个携带着厚重意义并且成功流行的象征,往往需要把文化原型,个人创建,集体复用,这三种方式结合起来:希特勒创用的Swastika(万字)象征,利用了雅利安神话中的原有符号,加以个人设置,信徒们坚持重复,在实践中填充“雅利安种族主义神话”内容,结果成了纳粹法西斯主义的恐怖象征。

五

而这种品格获得,与文化提供的“超常语境”有很大关系。复现形象渐渐积累意义成为象征,实际上是许多特用符号建立意义的手段。国家旗徽,城市地标建筑,王室贵族纹章,机构标识,直到品牌图像,都是靠一再复现方式形成象征意义积累,因此各种宣传或广告,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突出象征标志的机会。

这就关系到当代社会品牌的建立方式:大公司的商标图像称为Logo(如耐克的钩,麦当劳的M,肯德基的人头,英特尔的字形,奔驰车的蓝黑图标等等),原本是有理据性的修辞符号(例如字母是品牌缩写)。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,象征性增加,超出原先“意图定点”的意义,延伸义扩大到全世界的消费者都只认图标而不管“真实品

^① C. G. Jung. Memories, Dreams, Reflections (New York: Vintage Books, 1961) 其中说:“我知道,发现曼陀罗作为自我的表现形式,是我取得的最终成就”。

质”。当全球化向纵深发展,西方出现了“反 Logo 霸权”运动:商品图标的象征意义,远远超出全球化之前的文化想象。^[19]

商品品牌追求象征化,当代大众传媒则提供了象征化所需要的复用机会,而且把这个需要相当长时间的过程缩得很短。实际上大量网络语,如“打酱油”、“俯卧撑”、“躲猫猫”、“被增长”,也是有人发明,众人接上,在网上大量重复,直到最后成为具有特殊的表现方式。当代所谓迅速爆红的名人,也是这样一种网络语大众传媒之间接力的人物象征。

这是所谓后现代社会在象征化上的一个特点。“现代的艺术作品,其特征在于本质性和暂时性的统一。这种当下特性在艺术和时尚、新颖以及游手好闲者、天才、儿童的外表之间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。”^[20]这个趋势愈演愈烈,速度越来越快,例如“芙蓉姐姐”、“犀利哥”,“凤姐”之类的人物,忽然成为全国名人,而且代表了一种概念,一种值得人们追求的“平民神话”象征。起先有人解释说这是中国人喜欢“围观笑话傻子”的恶习,是侮辱这些人;事到后来,恐怕是他们在笑话我们,笑话我们为他们成功地象征化添砖加瓦;毕竟要让那么多人来参与建设这些象征,不是一桩容易做到的事。

[本论文为 2008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“符号学理论研究:近年的发展与模式更新”(项目批准号:08BWM001)的研究成果之一。]

参考文献:

- [1] 钱锺书. 陆机《文赋》论卷[A]. 管锥编[M]. (卷三)北京:三联书店, 2007.
- [2] 茨维坦·托多洛夫. 象征理论[M]. 北京:商务印书馆, 2004.
- [3] 贺昌盛. 象征:符号与隐喻[M]. 南京:南京大学出版社, 2007.

[4] Sigmund Freud,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, quoted in Agnes Petoze, Freud, Psychoanalysis, and Symbolism, Cambridge and New York: Cambridge Univ Press, 1999.

[5] Ernst Cassirer, Essay on Human Being, 1944.

[6] George Herbert Mead, Mind Self and Society: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, Edited by Charles W. Morris, Chicago: Univ of Chicago, 1934.

[7] Pierre Bourdieu, “The Forms of Capital”. In J. Richardson (ed.)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, New York: Greenwood, 1986.

[8] 高亚春. 符号与象征—波德里亚消费社会批判理论研究[M]. 北京:人民出版社, 2007.

[9] 博得利亚.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[M]. 南京:南京大学出版社, 2009.

[10] 埃里希·弗洛姆. 被遗忘的语言[M]. 北京: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2001.

[11] 转引自涂纪亮. 皮尔斯文选[M]. 北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 2006.

[12] 费尔迪南·德·索绪尔. 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[M]. 上海:世纪出版集团, 2007.

[13]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, Ninth Edition, Oxford: Oxford Univ Press, 1411.

[14] 转引自托多洛夫. 象征理论[M]. 北京:商务印书馆, 2004.

[15] 戴志中. 建筑创作构思解析[M]. 北京:中国计划出版社, 2006.

[16] W. B. Yeats, Essays and Introductions, New York: Macmillan, 1961.

[17] Carl Jung, Man and His Symbols, New York: Dell, 1964.

[18] Ernst Cassirer, The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, 1988.

[19] Northrop Frye, Anatomy of Criticism, 1957.

[20] Naomi Klein, No Logo, Taking Aim at the Band Bullies, London: Harper Collins, 2001.

[21] 哈贝马斯.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[M]. 南京:译林出版社, 2004.

[责任编辑:郑迦文]